

高等教育经济学

——高等教育规模论

樊安群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5—1996 年海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经济学

——高等教育规模论

樊安群 著

南海出版公司

GAODENG JIAOYU JINGJIXUE

高等教育经济学

作 者 樊安群
责任编辑 刘孝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大学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7-5442-1222-X/F·66
定 价 1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简介

樊安群,1959年生,祖籍湖南长沙,长于西北。中学毕业后当过知青、矿工、基层干部。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考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毕业,供职于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从事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专著一部、译著一部。

前 言

中国高等教育从 80 年代中期起进入了第二个高速增长期,1998 年,正规高校在校生数达到 317 万人,所有高校在校生总数达到 589 万人。1999 年,正规高校在校生数之增长率为 20%,将达到 370 万人,这样,高校在校生总数将突破 600 万人。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否合理,是否与当前中国经济实际水平(GNP 和人均 GNP 及就业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有效需求相适应?反言之,中国高等教育的增长幅度是否超出了对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之有效供给的限度?

我认为,中国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制约和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的适应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复杂,这就如同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较之发达国家更为复杂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的药方对发达国家适用而对转型中的国家之经济却没有效力的原因。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当其经济在结构上尚未基本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化以前,当其粗放的发展方式没有转到集约的轨道上之时,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相互制约、促进的关系就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其相异的一面。因此,在研究上述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GNP 的真实性以及人均 GNP 的实际意义

转型经济仍具有粗放型经济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增长速度快,但经济效益差,水分很大。这个问题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至今未能有效解决,据中国信息报 1997 年 4 月 11 日报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次普查时,认为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挤掉了乡镇企业 40% 的水分,压缩了 1.8 万亿元的虚报产值。而有关人士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测算,1996 年全国乡以上企业库存商品累计总值已达 1.3 万多亿元。再加上商业,乡镇企业及其它合资企业的库存总值已高达 3 万亿元,约相当于当年 GNP 的 38%。这样,GNP 的含水量就很大。此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也使中国 GNP 的真实性打了折扣。联合国在 1993 年发表了单独帐户指南,试图把经济与环境两方面的统计方法统一起来,建立“绿色 GNP”和“经济净福利”概念,即在 GDP 中扣除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 90 年代每年因上述原因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 GDP 的 6%—10% (世界银行估计为 8%,约为 540 亿美元),如此一来,中国的有效 GNP 就比名义 GNP 少得多,与之相联系,人均 GNP 的实际意义自然也就有一定的泡沫因素。

二、经济结构性制约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

中国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已有 20 年了,买方市

场初步形成。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远未完成；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也是任重道远。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相关性历史考察，二者之相关性远高于基础教育，尤其是经济结构及相应的产业就业构成对高等教育产品的制约及依存度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考虑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问题，既要重视 GNP 和人均 GNP，更要重视经济结构和就业构成。根据现阶段的情况看，存在一种奇怪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平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迅速增加；1992 年为 18.6 人，1993 年为 21.4 人，1994 年为 23.4 人，1997 年为 25.7 人，高级人才的就业竞争比较激烈，其程度虽逊于兰领阶层，但竞争加剧是明显的。据 1997 年统计，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之下岗者为 483 万人，从 1998 年开始，三年间又要增加 150 万人，总数将达到 633 万人（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将达 3000 万人）。很显然，在中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过程中，大学生的供过于求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压力很大，每年新增 100 万失学儿童。虽经“希望工程”努力缓解，集资和投入 13 亿元人民币，建了 6000 多所希望小学，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失学队伍，却也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的比重，按财政拨款来算，大、中、小学生生均经费之比为 1:2.7:50；换言之，多培养一个大学生，就要有 50 个适龄儿童为此付出不能受教育的代价。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要求我们在处理高等教育规模时，必须重点考虑经济结构变化对高级人才需求的制约，也要顾及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此外，高等

教育产品的供过于求(不论是总量或者是结构性的),不仅会造成经济问题,而且会造成社会问题;它不但对经济发展起不到推动作用,反而会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去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

本书的目标就是想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制约中寻求二者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建立一个能够评价高等教育适度规模的综合指标体系。所谓适度规模,就是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等教育产品数量。在这个规模幅度内,高教产品数量基本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对经济起最佳促进作用。而超过这个幅度,虽然也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却造成资源浪费,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部分必然相应减少;也就是说,在规模上超过此幅度越多,造成的有限资源的浪费越大,能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越少。当我国还处于大搞“希望工程”、平均年失学儿童达到100万的时期,那种不顾基础教育的状况片面追求高等教育的普及显然是违背社会发展目标的。历年来,不但存在总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经费分配的矛盾。因此,解决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既有助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宏观规划,也有助于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确定合理的经费分配比例。使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很显然,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应该是国家宏观决策的重点之一。

本书从宏观经济学角度、从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函数关系入手,通过对世界八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

育发展规模的相互关系的 100 余年历史的考察,确定了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呈对数曲线形态,从而通过对数方程建立了“经济——高等教育规模”一般数学模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分析,提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四阶段对应理论和产业结构的共性、主导产业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观点;通过乘数分析提出了四阶段中经济——高等教育相互关系的乘数特点及其运行曲线;通过分阶段的高等教育经费分析,得出年生均高教经费的一般数学模型,从而建立了 GNP、人均 GNP、产业结构、两种乘数、两种高教规模扩大边际效应系数、高等教育机会成本与高等教育产品(大学毕业生)价格扭曲程度、生均经费水平等八项评价指标的“高等教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宏观规划和高等教育的适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ABSTRACT

Since 1930s, the planning for the amount of advance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many countries. In most cases, the plann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counting and forecasting from the professional need of economic system, with the result of more failure than success in general and at the cost of time, human power and huge sum of money. The same problem also exists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 scale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in the condition of seriously unbalanced development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moderat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policymaking.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exterior law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takes the way of fun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examines the hundred-years-long history of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standar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eight large countries, so a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logarithmic curv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tandar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t up a general mathematic model of "economy—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by logarithmic equ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with the four stages of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eneral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viewpoint that the leading industry decid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also raises the multiplier feature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ur stages and the operating curve of the multiplier.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paper draws out a general mathematic model of

annual higher education expenditure per student after analyz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enditure by stages. As a result, eight evaluation criteria such as GNP, GNP per capit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wo multipliers, two marginal utility coefficients of the scal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wisted degree of opportunity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and expenditure standard per student, etc, compris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riteria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al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cro planning for the amount of advance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for moderat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国外与高等教育规模有关的研究及 方法论评介	16
第二章 八国高等教育规模基本决定的因素的 共性分析	27
第一节 对象国与截选年代背景特征的确定	27
第二节 “经济——高等教育规模”模型的理论架构	31
第三节 模型的运行与基本分析	41
第三章 经济与高等教育的阶段对应性及经济结构 在对应性确定中的地位	89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的客观性	89
第二节 经济发展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对应性及 经济结构在对应性确定中的重要地位	92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相互关系的乘数分析.....	120
第四章 八国高等教育经费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模型	165
第一节 高等教育经费研究的必要性.....	165
第二节 “经济发展阶段——高教经费水平”模型.....	168
第五章 对几种发展模式的大国的高教发展规模评价	177
第一节 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77
第二节 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177
第三节 自然演进型国家高教规模“理论——实际”	

	曲线的对比研究	180
第四节	两次赶超型国家高教规模“理论——实际”曲线的比较分析	191
第五节	发展中国家高教规模“理论——实际”曲线评价	207
第六节	小结	232
参考文献	28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高等教育自 50 年代初期以来,在发展规模和速度上经历了两起一落的曲折过程:10 年上升,第一个波峰出现于 1958—1960 年,在校生总数达百万余人;第二个波峰始于 1985 年,至 1989 年在校生总数(包括成人高校生)达到 332.3 万人。这一规模已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前苏联、印度、居世界第四位。1998 年,高校在校生数达到 589 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高等教育发展起伏如此之大,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所罕见,它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控制的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等教育规模决策之理论的不成熟性。

如何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问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 1986 年之前,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决策部门和高等教育理论界的重视,从国家宏观决策的意见和高教理论界发表文章的时间及数量即可见一斑。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众所瞩目,社会上普遍认为这种快速发展具有补课(文革十年高等教育萎缩的损失)性质,自然不存在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月晕而风”、“一叶知秋”,高等教育界的少数有识之士对此已有不同看法。已故的教育部长蒋南翔于 1982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略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单纯追求升学率问题》一文,从高等学校数量增长和大学招生规模上回答了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是否太慢的问题。他认为当年的发展速度过快,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和稳步地发展数量,并且指出不能以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率作为衡量大学招生规模的依据。显然,积多年的

经验,他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①出发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规模持谨慎态度。潘懋元教授于80年代初期根据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和50年代末期高等教育规模盲目扩大的教训,着重指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制约作用,但是这一观点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83年,原教育部提出了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初步设想,要求高等教育规模在1990年达到前苏联1983年的水平,即在校大学生数(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达到500万人,研究生达10万人。^②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在这一号召下,地方高等教育加速发展:1986年普通高校总数由1982年的715所猛增至1054所,在校生也从1982年的115万人增至188万人。除此之外,成人高校亦急剧增长,1986年达1420所,在校生数达185.6万人,比1982年的66.2万人增加了200%;1985年这一年,成人高校招生数为78.8万人,就比前一年的47.4万人增加了66.24%;也就是说,1986年前后,没有根据经济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关系之规律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高校数量增长过快,盲目升格,不顾师资、校舍、图书、设备等基本办学条件的限制,扩大招生,分散了有限的教育投入。一方面财政负担过重,另一方面质量下降,这才引起了教育决策部门的重视。为此,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以之衡量,全国1054所普通高校(包括全日制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有90%达不到要求,^③普通高校尚且如此,两三千余所成人高校更不待言。《暂行条例》的颁布及衡量结果,客观上已反映出高等教育总量规模已超出了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四项指标,

^① 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指大学自身指导思想、培养目标和客观条件(校舍容量、师资水平、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后勤供应水平等)所能容纳的保证质量的大学生能力。如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普通采用的高等教育扩大发展的典型公式:10:1:100,即要想多培养10名大学生,就需增加1名教师和100平方米额外的地皮,就是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一种体现。

^② 《中国教育报》,1991年4月16日第2版。

^③ 《中国教育报》,1991年4月16日第2版。

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信号。随之，国家教委于1988年底发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充实整顿工作的意见》，并于次年3月首次公布了办学条件很差的9所学校停止招生的名单，内定了部分办学条件距离国家规定标准尚有一定差距的学校名单。其侧重点在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以现有高校的办学条件的改善为主，稳定高等教育规模。据统计，1989年至1991年的3年中，共“停招”57所，通报277所^②。从决策部门的宏观控制来看，是力求稳定现有招生规模，提高质量，不存在现有规模的持续性超过社会总需求的问题，《人民日报》于1989年5月14日报道，当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协调会的信息是“社会总需求仍超过总供给”。似乎除了需求方向与毕业生意向的矛盾外，尚不存在毕业生分配难的情况。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了对大学生分配难的看法：“现在毕业生分配中暴露了不少矛盾，除了人事政策上的原因外，不能不说是那种不讲前提条件的所谓‘广开学路’所带来的盲目的‘高教热’等等的一个回答。”^①许多省的高等教育刊物和部分报刊亦纷纷刊登有关高校毕业生分配难的文章和调查报告。国家教委于当年做出规定，“凡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必须按本单位职工数的2%进大学生。”这一硬性安排大学毕业生的措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亦反映出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的尖锐性，决非需求方向与毕业生意向的矛盾可解决的。各省市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印证了实际生活中人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日趋严重的问题。以北京市为例：1986年，北京各单位上报的人才需求数为3.5万，1987年和1990年分别降至9000人和8000人。为此，北京市提出对专业人才实行战略储备的“网开一面”的政策：分配到企业的大学生，由市人事部门专拨干部和工资指标；大学生到单位第一年，不增加单位的承

^①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周贝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序。

包指标；积极接收大学生的单位，适当增加工资总额。中央院校分给北京的毕业生，给多少要多少，对外地的优秀毕业生也积极接收。^① 总之，国家教委和各省市的类似规定是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当时这两个信号表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实际已经提出了如何认识这一增长的性质和处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从1990年到1998年的这8年之中，正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转换的重要时期。1989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非攻坚阶段，主要吸纳大学毕业生的国有企业没有实行实质性的减员增效的改革，所以大学毕业生分配难的压力虽然存在，但是，还没有尖锐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使原来吸纳大量高校毕业生的接收源失去了容纳能力，据统计，1997年全国共有下岗职工2415万人（其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占下岗职工总数的7.3%，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800万人，预计1996年新增下岗职工35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严重影响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如果分配或自谋的专业不对口，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这就从经济结构及经济总量两个方面提醒我们注意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发展问题。

从高等教育界就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问题发表的文章来看，也反映出类似的认识过程。据作者了解，最早的当推发表于1984年初的《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文。^② 文中关于建国初期院系调整后的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和关于1958年教育革命主要经验教训的第五条有启发意义：“这次改革，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从1919年到1954年

① 《人才纵横》（广东）1991年第5期第5页。

② 《教育科学研究》（武汉师院）1984年第1期。